

库流斯案件评析

徐国栋*

内容提要：公元前 93 年发生的库流斯案件的两造分别由法学家谢沃拉和演说家克拉苏斯代理，前者主张字义说，导致主张遗嘱无效，适用法定继承；后者主张真意说，大胆补充遗嘱的漏洞，维护遗嘱的效力。后者胜诉，表明古罗马的遗嘱解释已从严格解释走向衡平解释，也表明罗马律师中演说家派对法学家派的胜利。这个案件由于其包含的丰富意义，在历史上引起了长久的众多讨论。该案的要旨对于处理我国的遗嘱解释问题也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未成年人的替补继承；遗嘱解释；字义说；真意说

一、案情和诉讼程序

库流斯案件作为一个法庭演说技巧的范例，其案情和法庭辩论过程被西塞罗在《论寻找》、《论演说家》、《布鲁图》、《为切其流斯辩护》、《地方论》中保留许多，晚一些的昆体良也在自己的《演说术阶梯》（7，6，9-10）中对该案做了报道。^{〔1〕}两个作者都对此案中的法律要点以及原被告双方代理人演说的成败得失进行了分析。近现代法学家更多地把此案看做大陆法系第一个遗嘱解释的经典范例倾注了不少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大多反映在本文的注释中，这些作者的国籍体现了对库流斯案件研究的国际性。在国内，周相先生的《罗马法原论》也涉足这个案件的分析，^{〔2〕}可惜过于简略且有一些误述，^{〔3〕}本文试图为中文世界增加研究这个古罗马遗嘱解释的案例之文献作出贡献，并力图介绍共和晚期罗马的遗嘱解释实践，从而为我国的遗嘱解释理论提供启示。

库流斯案件的案情大致如下：公元前 93 年，某个科泊纽斯（Caponius）误以为妻子怀孕，而自己大限将至，故针对自己的遗腹子立下遗嘱：其辞曰“如果为我生了一个或几个儿子，让他或他们做我的继承人。如果我的儿子在他成为自己的监护人前死亡，那么让他当我的继承人”。^{〔4〕}此语最后一句中的“他”，指库流斯（Manius Curius）。通过最后一句的安排，库流斯成为科泊纽斯可能的儿子的替补继承人。替补继承分为普通替补和未成年人替补，库流斯勉强属于

* 厦门大学法学院罗马法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

〔1〕Cfr. Rino Faranda e Piero Pecchiura, *L'Institutione Oratoria di Marco Fabio Quintiliano*, UTET, Vol. I, 1968, p. 99.

〔2〕参见周相《罗马法原论》（下），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第 473 页。

〔3〕例如，周相先生说科泊纽斯指定库流斯为其遗腹子的监护人兼替补继承人。事实上，只存在替补继承人指定，不存在监护人指定。周相先生加上这个指定，可能是错看了遗嘱中的“如果我的儿子在他成为自己的监护人前死亡”的文句。

〔4〕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西塞罗全集·修辞学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46 页，译文有改动。

后者。前者是遗嘱人指定两个或更多顺位的继承人，如果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先于他死亡或不能继承，则由第二顺位的继承人继承。以此类推。后者是父亲为自己未适婚的儿子代订遗嘱处分后者的遗产，条件是遗嘱人的儿子成为了继承人，而在适婚前死亡，此时，替补继承人成为上述儿子的继承人。这样就避免了自己的儿子无遗嘱而死，假若替补继承人真的取得了遗嘱人的遗产，他的地位很类似于连续信托中第二个信托的受益人，所以，不妨把科泊纽斯与库流斯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信托替补（Fiduciary substitution）。

在整个遗嘱中，遗嘱人以“如果为我生了……儿子”的文句明确承认了自己是否有孩子的不确定性。⁽⁵⁾ 科泊纽斯死后，其妻并未生育，看来她要么是自己求子心切，产生了虚假的妊娠反应；要么就是以诈孕有所图。⁽⁶⁾ 无论如何，科泊纽斯的妻子未生下孩子导致科泊纽斯的最近的宗亲马尔库斯·科泊纽斯作为法定继承人要求遗产，因为按《十二表法》第五表第4-5条规定的法定继承顺位，在没有当然继承人（第一顺位的继承人）的情况下，遗产由最近的宗亲继承（第二顺位的继承人）。换言之，马尔库斯认为死者的遗嘱因为无人根据它继承遗产失效了，科泊纽斯陷入了无遗嘱而死，其遗产转入法定继承。这是罗马人最不愿遇到的情况，正如梅因所说的“诅咒一个敌人，说他要死而无遗嘱要比任何诅咒都苛刻”。⁽⁷⁾ 因为某个宗亲相对于被继承人的亲等因为亲属的死亡和出生不断变化，确定最近亲等的时间应该是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在确实未立遗嘱的情形如此）或所有的遗嘱继承人都拒绝接受遗产的时间（在立了遗嘱的情形如此），因此，“最近的宗亲”的形成意味着偶然，很像轮盘赌。当然，谁也不愿自己的遗产落到不是自己预计的人的手中。而且，罗马的继承并不以析产为前提，所以，如果当然继承人继承，他们在成年的情形参与了遗产的形成，其继承具有析产与传承遗产的二重性，析产的成分的存在使他们取得遗产更有道德上的正当性，而最近亲等的宗亲并未参与遗产的形成，他们取得遗产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

然而，库流斯也出来主张遗产，他说科泊纽斯的妻子没有生下孩子不应影响他厚待自己的意图之实现。按西塞罗的观点，库流斯这样做是鲁莽的。他说“难道有人根据家父在其儿子出生前订立的遗嘱要求遗产？任何人都不会，因为儿子出生会打破遗嘱。这种类型的案件在法律上不许争论”。⁽⁸⁾ 此语涉及的悖论在于：遗嘱由于未考虑到母腹中的子女会因此等子女的出生而打破，因为罗马人遗嘱的有效要件是要考虑到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和所有的遗产，不许留空白，而科泊纽斯的遗嘱恰恰考虑到了此等子女而订立，此等子女的出生是否要打破遗嘱是一个问题，若其不出生、遗嘱是否还有效更是一个问题。于是，马尔库斯·科泊纽斯与库流斯相持不下，形成诉讼。案件由百人法院审理。

那么，什么是百人法院？百人法院（Centumviri）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主要审理遗产继承和大额财产索还案件。它与十人法院（xviri stiliibus iudicandis）并立，共同构成由裁判官主持的常设法院，主要负责审理个人身份案件，例如自由身份案件。⁽⁹⁾ 百人法院起初有陪审员105人，他们来自35个部落，每个部落有3个名额。他们分为4个法庭（Tribunalia）办案，因此，某案实际参审的法官不会有100人。后来，百人法院的人数增加到180人。该法院不承担案件的法律审（in iure），此等程序由长官（例如裁判官）承担。在法律审完成后，案件才到从百人法院名

(5) See John W. Vaughn, Law and Rhetoric in the Causa Curiana, In Classical Antiquity, Vol. 4, No. 2 (1985), p. 212.

(6) 关于罗马法对诈孕的处理，参见徐国栋《罗马私法要论——文本与分析》，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3页及以次。

(7) 参见[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4页。

(8) See M. T. Cicero de Oratore: Or, His Three Dialogues Upon the Character and Qualifications of an Orator, R. P. & C. Williams, Cornhill Square, 1822, p. 96. 此处的“打破”的意思是后发无效。

(9) See A. H. J. Greenidge, Roman Public Life,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London, 1901, p. 236.

单中选出的陪审员组成的法院，进行事实审（in iudicio）程序。这种法院于3世纪消失，⁽¹⁰⁾ 因为那时统一完成法律审和事实审的非常法院已经建立。所以，百人法院只存在于罗马适用法律诉讼和程式诉讼的时期。

库流斯案件的法律审是由什么长官完成的？今已不可考，也不重要，但盖尤斯告诉了我们这一法律审包含誓金之诉。“显然，在向百人法院提起诉讼时，首先应当在内事裁判官或外事裁判官前依照法律进行誓金之诉”（4，31）。⁽¹¹⁾ 誓金之诉是当事人在诉讼进行中各宣誓证明其权利正当的程序，誓金按诉讼标的的一定比例抽取，败诉者丧失誓金。例如，《十二表法》第二表第1条规定：诉讼标的在1000阿斯以上，交誓金500阿斯；标的不满1000阿斯，交誓金50阿斯。关于自由身份之诉，一律交50阿斯的誓金。⁽¹²⁾ 所以，库流斯跑出来争遗产是有风险的。史料未告知我们科泊纽斯的遗产价值几何，假若在1000阿斯以上，库流斯不光得不到遗产，而且要承担科泊纽斯遗产额一半的罚款，后果不可谓不严重。

对于库流斯案的事实审，西塞罗留下了较为完整的记录。我们由此得知，当时最有名的法学家昆图斯·穆丘斯·谢沃拉（Quintus Mucius Scaevola，公元前140—公元前89年）担任M. 科泊纽斯的代理人（科泊纽斯很可能是谢沃拉的门客，谢沃拉为他出庭可能是尽恩主的义务），当时最有名的演说家L. 克拉苏斯（Lucius Licinius Crassus，公元前140—公元前91年）担任库流斯的代理人。两者都大名鼎鼎，前者是法学家中的演说家，后者是演说家中的法学家。谢沃拉是公元前95年的执政官；克拉苏斯是同年的执政官。他还在公元前92年担任监察官。⁽¹³⁾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描述，是两位前总理级的高官在库流斯案件中“碰撞”上了。

二、原告律师谢沃拉的立场

案发时，遗产似乎已在库流斯手中，故案由是要求遗产之诉（Hereditatis petitio）。⁽¹⁴⁾ 这是一种合法继承人向遗产占有人要求返还遗产物的诉权，由此，马尔库斯·科泊纽斯处在原告的地位，这导致其代理人谢沃拉先发言，这使得他处在立论的地位。按理说，这是一个有利的地位，因为科泊纽斯遗嘱的问题太多了。首先，依事理之性质，未成年人的替补继承人指定以未成年人已经存在为条件，而科泊纽斯在未成年人尚未存在的情况下就为他指定了替补继承人，这样的指定应该无效，如同在只有一个鸡蛋的情况下就蛋孵化出的鸡，鸡再生的蛋，再孵化的鸡作处分的遗嘱不可能有效一样（事实上，科泊纽斯的地位比这里的“鸡农”更糟，后者手里还有一个蛋，他却连一个“蛋”都没有，只是相信他妻子肚子里有一个“蛋”），因为那第一个蛋能否被孵化为鸡或是否被蛇偷吃都是一个问題。对于科泊纽斯来说，即使他妻子真的怀孕了，还有流产的可能呢！其次，退一万步讲，科泊纽斯的妻子真的怀孕了，其胎儿是否有遗嘱能力，也是个问题，通常的规则是自然人必须活着出生才有此等能力，因为按照古法，胎儿属于不确定的人，不具有遗嘱能力。⁽¹⁵⁾ 确实，此等胎儿是否能活着出生，是单数还是复数，都属于未知之数。遗嘱人科泊纽斯深明此点，其遗嘱同时考虑了单胞胎和多胞胎的情形，以避免陷入被指定者不确定的不利局面。但为了照顾胎儿，库流斯案件时代的罗马法显然已赋予了胎儿消极的遗嘱能力，不然科泊

(10) See Adolf Berger,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Roman Law*, Philadelphia,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91, p. 386.

(11) 参见〔古罗马〕盖尤斯《法学阶梯》，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2页。译文有改动。

(12) 参见徐国栋，〔意〕阿尔多·贝特鲁奇著《〈十二表法〉新译本》，〔意〕纪慰民译，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11期。

(13) See Michael C. Alexander, *Trials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149 BC to 50 BC*, In Phoenix, Supplementary Volume xxvi, p. 48.

(14) 同上。

(15) Véase Pedro Gómez de la Serna, *D. Justiniani Institutionum Libri IV*, Tomo I, Libreria de Sanchez, Madrid, 1856, p. 126.

纽斯就不会公然指定其遗腹子为继承人了，但基此的遗留的效力取决于胎儿活着出生。⁽¹⁶⁾而在科泊纽斯继承案中，这个条件未成就，也不可能成就。这样，科泊纽斯的遗嘱以其妻生育男孩为成立条件，这个条件不成就，他的遗嘱就无效，其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这样办按市民法当然没错，但把科泊纽斯置于无遗嘱而死的悲惨境地，犯了罗马人的大忌，违反了罗马法中的拯救遗嘱效力原则。⁽¹⁷⁾非独此也，如此还剥夺了库流斯对科泊纽斯遗产的期待权，而科泊纽斯之所以把库流斯指定为其遗腹子的替补继承人，可能是为了酬报先前给予自己的恩惠，剥夺了他的期待权，就把科泊纽斯置于了忘恩负义的境地。总之，严格依法办事可能拘泥于法律的文句，忽略了其精神 [正因为这样，较早研究库流斯案件的德国法学家 Johannes Stroux (1886 - 1954 年) 把自己著作的标题定为《法之极，不法之极》(Summum ius, summa iniuria)，⁽¹⁸⁾真是一语破的!]，而且可能把法律与人情对立起来。何去何从？谢沃拉必须做出选择，且让我们看他如何选择。

遗憾的是，他采取了“不法之极”的解释。他利用文句与意思的关系 (Scriptum et voluntas) 的地方 (Locus)⁽¹⁹⁾ 展开论述，采取了文句应与意思一致的方略。在他看来，如果科泊纽斯真想让库流斯当继承人，他应当在遗嘱中写上“让我的儿子成为我的继承人。如果我的儿子不能成为我的继承人，或如果成为了我的继承人但在适婚前死亡，库流斯成为继承人”的标准文句，但他未这样写，这就意味着库流斯不能当继承人。谢沃拉充分而准确地引用法律条文和古代先例从正面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时还从维护法律的安全性的角度从反面证明自己的观点：如果忽略遗嘱中的准确用语，而是要凭猜测来确定遗嘱人的意图，要是能干的律师能够颠倒头脑简单的人写成的文字，那就是给普通人设下的一个圈套。所以，应坚持严格解释的原则，谢沃拉说自己的父亲普布流斯 (Publius) 就是这样做的。⁽²⁰⁾既然遗腹子根本不存在，库流斯当不了继承人，那就要适用法定继承。自然要由最近的宗亲马尔库斯·科泊纽斯继承遗产了。

三、被告律师克拉苏斯的立场

被告代理人 L. 克拉苏斯后发言。他的发言的许多内容是对谢沃拉的论点的批驳证明。他发言在后，先发言者处在立论的地位，后发言者处在驳论的地位。他的发言分为 3 个层次。首先是对谢沃拉的调侃，说他像一个在海边找到一个桨架就想据此造一条船的小男孩一样，打算根据一丁点理由建立其立论。⁽²¹⁾ (21) 这“一丁点理由”为何？按匈牙利学者 Miklós Könczöl 的研究，是“一个人必须生了才能死”这一命题，⁽²²⁾他对科泊纽斯遗嘱无效的整个论证都端赖于此。既

(16)然而，由于在许多其他问题上，遗腹子女被认为如同已出生，在这一问题上也可以推定，遗腹子女同已出生的子女一样，可以通过遗嘱被赋予监护人，只要他们处在这样的情况中：如果他们在尊亲生存时出生，他们会作为自权继承人并处在后者的权力下。参见 [古罗马] 优士丁尼著《法学阶梯》(第二版)，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7 页。

(17)马尔切勒《学说汇纂》第 11 卷“如果遗嘱中有模棱两可甚至是错误的规定，它要受到宽宏大量的解释，按宽宏大量的解释，任何被设想为可信的意图，必须得到相信。”马尔切勒《解答集》单卷本“除非遗嘱人显然另有所指，不必背离文句的意思。”保罗《萨宾评注》第 3 卷“在遗嘱案件中，我们把遗嘱人的意思解释得更完整。”保罗《告示评注》第 9 卷“对模糊不清的文句，通常要注意其更合于情理的意思或起草人在多数情况下惯于赋予的意思。”参见 [意] 桑德罗·斯奇巴尼选编《民法大全选译·法律行为》，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05 页及以次。发表上述言论的法学家都属于帝政时期，晚于共和时期的克拉苏斯许多。所以，Johannes Stroux 说他开启了法解释史上的一章，并非无理。

(18)Vgl. Johannes Stroux, Summum ius, summa iniuria. Ein Kapital aus der Geschichte der interpretation iuris, Leipzig/Berlin, 1926.

(19)地方是能提供论据之所。在希腊-罗马的修辞学中，“文句与意思的关系”是一个地方，论者可以从文句方向发力压倒意思，也可从意思方向发力压倒文句。这个地方既可用于解释-批评法律，也可用于解释-批评合同、遗嘱等私人文书。

(20)前引 [4]，西塞罗书，第 720 页。

(21)同上，第 721 页。

(22)See Miklós Könczöl, Law, Fact and Narratives in Ancient Rhetoric: The Case of the causa Curian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Semiotics of Law, Vol. 21 (2008), p. 30.

然预想的遗腹子未生，他就不会死，所以，涉及他的替补继承人指定就无效。由于整个遗嘱仅以继承人指定和替补继承人指定为内容，遗腹子的不出生犹如第一块骨牌，带动了整个多米诺骨牌的倒塌。这样的抠字眼解释当然无逻辑错误，但它未考虑到遗嘱人以及替补继承人的利益，显然不足取。其次，克拉苏斯像谢沃拉一样，采用文句与意思的关系的地方立论，不过方向相反。谢沃拉采取的是文句方向，克拉苏斯则采取的是意思的方向。他认为，遗嘱人的真意显然是在自己的儿子没有一个活到适婚年龄时，库流斯成为他的继承人，无论自己的儿子在他死时尚未出生还是未适婚而死，都是如此。⁽²³⁾ 当然，真正发生的是第一种情形，也就是科泊纽斯死时他的儿子尚未出生的情形。如前所述，这种情形应不包括在未成年人的替补继承制度的涵摄范围内，显然，克拉苏斯为了达到自己的解释目的，对未成年人的替补继承制度进行了一个目的性扩张。为了掩盖此举的破坏性，克拉苏斯强调大部分人都这样写遗嘱，而这样写是有效的，并且始终有效。⁽²⁴⁾ 这看起来像“众人皆错的即为对”的论证。或许可以类比于文字读音中的现象，比如在中国大陆地区多数人把曝（Pu）光读成曝（Bao）光导致后者取代了前者，比如在四川省，众人都把“臀（Tun）部”读成“臀（Dian）部”导致前者在该省成为错误。这只是克拉苏斯的正面论证，同时他还做了如下反面论证：反过来讲，如果遗嘱人愿意将其遗产留给法定继承人，便会指定他为其儿子的替补继承人，但他并未指定，这便意味着排斥他们。⁽²⁵⁾ 最后，克拉苏斯从具体上升到一般，强调遗嘱行文的自由，支撑此等自由的是对遗嘱人意图的尊重，有了这种尊重，遗嘱文句的某种程度的不合常规便不重要。克拉苏斯认为这样的安排是正义和平等的。相反，如果要按谢沃拉的要求立遗嘱，就无人敢立遗嘱了。到这里，克拉苏斯似乎走向了强词夺理：谢沃拉有何专制权力要求人们这样立遗嘱？⁽²⁶⁾ 之所以说克拉苏斯“强词夺理”，乃是因为他把市民法的要求硬说成谢沃拉的要求，意图投那些马马虎虎订遗嘱的人所好，把他们的丢三落四合法化。然而，多数人都是丢三落四的，讨厌循规蹈矩的，这点加上克拉苏斯高超的演说技巧，让他在法庭上赢得了一个满堂彩，他的当事人也因此胜诉，作为后果，马尔库斯·科泊纽斯痛失相当于科泊纽斯遗产一半价值的誓金，可谓求得遭失。无论克拉苏斯的演讲对于严格法治是否具有破坏性，遗嘱人科泊纽斯若在天有灵，当感谢他和百人法院，因为他们拯救了遗嘱的效力，避免了让他无遗嘱而死。而且，库流斯也应做同样的感谢，因为克拉苏斯把明示的未成年人替补继承解释成默示的普通替补继承从而避免了法定继承，⁽²⁷⁾ 他的替补继承人的地位得到了拯救。

四、谁笑到了最后？——代结论

库流斯案展示了两个有意味的对立。一是遗嘱解释上的字面解释说与真意解释说的对立，二是罗马辩护士队伍中法学家派与演说家派的对立。容分述之。

在遗嘱解释上的字面解释说与真意解释说的对立中，后者获胜，因为它对遗嘱的解释不是从文句出发而是从衡平出发，注重的是遗嘱的精神而非遗嘱的文句。这一转变据说是在希腊的衡平思想的导引下完成的。⁽²⁸⁾ 但克拉苏斯的胜利仅仅是昙花一现的，因为他对科泊纽斯遗嘱的解释太狂飙突进了，故罗马人并不把库流斯案件的判决结果作为先例遵循，只是到了马尔库斯·奥勒

(23)前引〔4〕，西塞罗书，第721页。

(24)同上。

(25)前引〔2〕，周相书，第473页。See also William Forsyth, *Hortensius the Advocate, An Historical Essay on the Office and Duties of an Advocate*, Jersey City, Frederick D. Linn & Company, 1882, p. 97s.

(26)前引〔4〕，西塞罗书，第721页。

(27)前引〔22〕，Miklós Könczöl, p. 29.

(28)See John W. Vaughn, *Law and Rhetoric in the Causa Curiana*, In *Classical Antiquity*, Vol. 4, No. 2 (1985), p. 208.

留与维鲁斯共治时期（161-169年），两个皇帝颁布的一个敕令才确立了库流斯案件中包含的原则。⁽²⁹⁾ 其辞曰“一旦父亲为其未适婚儿子就两种情形之一指定了替补继承人，他被视为就两种情形指定了替补继承人，即其儿子不曾作为继承人存在的情形以及虽存在过但在未适婚时死亡的情形”。⁽³⁰⁾ 其中最后一句提到的“其儿子不曾作为继承人存在的情形”就是科泊纽斯遗嘱运作后的情形。所以，克拉苏斯的代理辞对于这一法律漏洞的填补有功。从此以后，罗马人不需要依靠解释处理科泊纽斯遗产继承案了，依靠法律即可。

在罗马辩护士队伍中法学家派与演说家派的对立中，也是后者获胜。这可能是现代人认为奇怪的现象，但在罗马共和时期却并不奇怪。首先我们要注意案件是百人法院审理的，其中的几十个陪审员并非专业法官，他们具有“不怎么讲法律，但讲感情”的特征，说服他们的最好技艺不是法学，而是演说术。⁽³¹⁾ 正因为这样，罗马共和国中演说家的地位高于法学家，西塞罗本人基于这种地位势差对法学改弦易辙。他起初学法学，后来改为学习修辞学，此乃因为他认为法学低于修辞学，只有不具有演说家品质的人才成为法学家。而所谓的演说家就是当时的律师，他们为了在法庭辩论中获胜，必须掌握辩证法。法学家与演说家的区别，在于他们鄙视言辞，重视法理，因此，其风格清楚、具体和简单，他们的解答以被授予的权威为基础，因此简短，不作过分的解释和推理。⁽³²⁾ 而演说家则是相反的风格。按苏格拉底的说法，他们认为人们在法庭里关心的不是真理，只考虑怎么说服人，而这是带有或然性的，主要的是能迎合大多数群众的意见。⁽³³⁾ 所以，法理讲过了头，完全忽略了说服可能也是糟糕的事情。把历史的链条放长一些也可以这样说：上述继承案中表现了法学家和演说家在工作方法上的差别，也为演说术与法学的合流埋下了伏笔。到了帝政时期，公立的修辞学校的课程就把修辞学和法学结合起来了。

在罗马法中，以遗嘱继承为优先，以法定继承为补充，以此尊重被继承人的所有权和意思自治，我国继承法对两种继承的关系是反过来。加上相当长一段时间限制私有财产，国人可以继承的标的有限。所以，遗嘱解释的任务没有古罗马那么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私人财产日多，人们也越来越习惯于立遗嘱处分自己的遗产，这就导致了遗嘱解释任务的加重。与合同解释可以询问表意人的意思不同，在需要解释遗嘱时，遗嘱人往往已死亡，不能询问到他的意思。所以，遗嘱解释者的操作空间远远大于合同解释者。如何以一定的解释原则控制上述操作空间，库流斯案件为我们提供了启示。首要的应是拯救遗嘱效力原则，因为遗嘱应被理解为优于法定继承的遗产处分，更体现了遗产所有人的意志以及他对关系人亲疏远近的权衡，所以，即使遗嘱有重大漏洞，也应通过解释弥补，而不是听任遗嘱因之无效。其次，在补充遗嘱人的意思时，要有起码的遗嘱文句作为基础，不能无地基建楼，像克拉苏斯那样。他对未成年人替补继承包括未成年人根本未出生的情形的解释，似乎有动摇未成年人的替补继承制度之嫌。遇到这样的替补继承人指定，还是要尊重法律，把牺牲遗嘱的效力当做为此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样的代价会提醒立法者修法补漏。事实上，克拉苏斯关于科泊纽斯不喜爱库流斯就不会把他指定为替补继承人的说法，更能用来拯救科泊纽斯遗嘱的效力。当然，如何在拯救遗嘱的效力这一原则与有起码文句基础补充遗嘱这一要求之间达至一种平衡，是一个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问题。

责任编辑：邓勇

(29) See Richard A. Bauman, *Lawyers in Roman Republican Politics: A Study of the Roman Jurists in their Political Setting*, 316-82 BC, CH. Beck, München, 1983, p. 349.

(30) See *The Digest of Justinian*, edited by Mommsen and Alan Wats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Philadelphia, 1985, Vol. 2, p. 851.

(31) 参见【古罗马】西塞罗著《论演说家》，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及以次。

(32) Cfr. Manuel Jesus Garcia Garrido, *Diritto privato romano*, CEDAM, Padova, 1996, p. 17.

(33) 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卷，第845页。